

# 文革思维：从苏区 反 AB 团和延安整 风到平定土改和文 革（上）<sup>1</sup>

**编按：**“上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两百万人死亡，影响了数亿人的生活。这样的结果一定有一些根本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文革思维”，它“现在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澳门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郝志东先生说。今年，2026年，距文革发动整整60周年，本刊特发表此文，以纪念中国当代史中极端荒谬、疯狂的一段岁月，检讨极权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最惨痛的悲剧之一。

文革思维模式在早期的革命运动中发展起来，在文革中达到顶峰，现在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文革思维的特征至少包括：1) 针对任何被怀疑为敌人的人所实行的阶级斗争和敌对思维；2) 用谬误性、专制性、非人性思维来区分敌我；3)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暴力思维。<sup>2</sup> 文革思维的每个部分都与其他两个部分相关并相互强化。

敌友二分的思维来源于意识形态纯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这种特征也并非中国独有。<sup>3</sup> 毛泽东在1926年3月出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小册子中说过一句名言，这也是收在毛选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德国哲学家、纳粹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一书中声称，敌友二分法是政治的核心。<sup>4</sup> 因此，为了将敌人（外部或内部）识别为潜在威胁，人们不应该使用理性分析、话语逻辑、客观判断或规范标准，而应该只靠“我们”与“他们”、生与死的感觉。不能有任何妥协。

敌人被“我们”认为是不齿于人类的人，等待着他们的是被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无情消灭的命运。这种对立思维正是纳粹、斯大林和波尔布特的大屠杀、大清洗的逻辑，也是中国土地改革运动和文革杀戮的逻辑，以及宗教

极端主义的逻辑。与大多数社会一样，这种思维及其引发的暴力，无论是为了声望、权力还是物质利益，也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在元素。<sup>5</sup>除了汉人之间以及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无数的杀戮之外，秦始皇（公元前 259-210 年）曾经活埋了数百名持不同政见的学者，八世纪的安史之乱死了三千六百万人，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死了两千万人。

以上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需要我们深入的研究和反思。本文首先简单介绍我们的研究方法。然后我们叙述贯穿在苏区的反 AB 团运动、延安整风、平定县的土改和文革中的敌对思维、阶级斗争思维。之后我们讨论几个谬误性的思维方式，包括非黑即白、极端思维；只要结论、不要证据；无限推导、无限上纲；思想专制；蔑视人的尊严。再后我们讨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暴力等等。我们强调了这不同运动之间思维的连续性。最后，本文讨论文革思维和当今中国的相关性。

由于文革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所以文革思维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本文所讨论的同一种思维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作用及其对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的持续影响，值得学术界更加认真的关注。

## 一、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

本文所依据的案例多来自山西省中部的平定县。在土改时期，全县分为正太铁路以北的平定（路北）和正太铁路以南的平定（路南）两个区域，共有 461 个村庄，总人口约 290,000。由于地区重组，文革开始时全县有 368 个村庄，约 265,000 人。<sup>6</sup>

本文的一部分调查材料来自对平定县一些村庄及县城经历过土改和文革的人们的采访。我们还使用了一些档案材料和当时的报纸报道。这些来源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村庄的相当详细和相对可靠的信息。有关该县在土改和文革中更多调查结果的报告，也见本人的《生死存亡十二年：平定县的抗战、内战与土改》一书以及本人与黎明合著的《平定县里不平定：山西省平定县文革史》。<sup>7</sup>

根据社会学方法论，统计的方法是实证的方法。我们的一些统计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土改和文革暴力的规模。访谈的方法或者当事人的回忆是阐释的方法，看当事人如何解释他们的经验。如果足够多的人在诉说着同样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的可靠性就比较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如下所述，让农民认识到地主是坏人，也需要很强的说服能力。

我们还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也即社会学的批判方法，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苏区反 AB 团、延安整风、土改、文革），看文革思维的沿革，尤其是从权力的角度去看文革思维的性质。

## 二、阶级斗争与敌对思维：苏区反 AB 团运动、延安的“抢救”运动、平定的土改与文革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的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揭示的，阶级斗争心态在革命早期就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敌我分明，没有灰色地带，来不得半点含糊。在苏维埃红区，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任何反对他们的人都是 AB（反布尔什维克）团份子，应该被消灭。<sup>8</sup> 于是在 1930 年和 1931 年，在江西和福建苏区，成千上万的红军士兵，其中包括

一些将领，特别是地主和富农家庭出身的士兵和干部，均被杀害。他们被怀疑为国民党派来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分子。酷刑是家常便饭，包括殴打、焚香、割女人的乳房等。

在 1942-1943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敌对思维与暴力事件仍在继续。斗争对象仍然是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人以及像王实味这样的知识分子。王实味批评延安的不平等现象。<sup>9</sup> 共产党认为日本和国民党派了大量的间谍到延安来，这些人必须被消灭。<sup>10</sup> 正如我们下面会详细讨论的，谬误的推理在起作用。如果一个人来自富裕的或有国民党背景的家庭，他就会被自然地怀疑为特务、间谍。建国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的雷任民作为国民党特务被“抢救，”他的妻子是日本的归国留学生，所以就被推断，她一定是日本间谍。<sup>11</sup> 人们被殴打、折磨，直到他们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或日本人的特务。<sup>12</sup> 酷刑的方法包括多天的睡眠剥夺、饿饭、殴打等。正如我们后面更多的例子所揭示的，在革命的名义下，人是没有尊严的。

延安及周边地区 40,000 多名知识分子中，总共有 15,000 人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其中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sup>13</sup> 正如蒋南翔后来在给刘少奇和党中央的报告中写到的那样，可能有少数国民党特务，但 99% 的自己供认为和被认定为特务的人都是被冤枉的。<sup>14</sup> 直到 1945 年，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罪名才被洗清。一部分人被保留疑问不予结论，继续受到社会部监督，让他们在迫在眉睫的和国民党对决的内战中来证明自己。<sup>15</sup> 其中有 100 多人被处决，包括 1947 年被处死的王实味。<sup>16</sup>

可见从共产党成立时起，阶级斗争就是中国革命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 1945 年至 1950 年代初的土地改革的思想基础。为了使土改运动取得成功，

中共需要将阶级斗争的理念、区分敌我的思想灌输到农民的脑海中。但是在平定，就像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在一开始并不容易。在中共动员群众来斗地主，说他们是如何如何坏的时候，农民通常的反应是“老财不赖。”<sup>17</sup>就像我们在本书关于暴力土改的第四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农民需要了解地主的确是坏的。我们在第四章引述了农民和土改工作队员之间的对话。农民一定要理解他有一年生病了，房东照顾他，并不是因为他穷，别人看不起他，但财主却看得起他。而是因为财主怕他死，因为如果他死了，财主就不会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了。财主的好心被看作是个阴谋。

农民首先要认识到地主确实是坏人。<sup>18</sup>然后工作队员会继续帮助农民“挖穷根”，指出地主和富农其实是在剥削农民。“点着火”以后，农民们就会意识到，他们所有的耕地都是被地主偷走的。地主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农民的血汗。认为有“好财主”或“善财主”的思想是错误的。按照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局派来的工作队队长杨献珍在土改会议上说的，如果你这样想，就说明你没有怀有阶级仇恨。<sup>19</sup>阶级仇恨、敌对意识的培养是对地主和富农施暴的第一步。

中共建政之后，阶级斗争一直都是意识形态的主轴，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等等运动中，都是如此。到了文革的时候，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的学说已经被彻底灌输到了人们的脑海中。连小孩子也都认为所有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都是坏人，人们对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正如雷锋所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平定县的文革就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一个阶级斗争接着另一个阶级斗争。

1966年，在“破四旧”（即代表着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中，城市和农村人们房顶上的陶瓷兽头被砸毁。五类分子等牛鬼蛇神再次被揪出来批斗、游街、被逼站在凳子上接受人们的审问和批判。

1967年，各单位开展了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阶级斗争。到1968年前后，造反组织被分成了两派，各自都将对方视为反革命的代表，最终导致了两派的武斗。1969-1971年，“清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浪费、投机倒把）运动开始了。阶级敌人从五类扩大到九类，加上了叛徒、内奸、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派中的一派（红总站）在这一轮斗争中失去了权力，成了反动份子。九种份子中的许多人自杀了。总之，有清理不完的阶级敌人。

1972-1977年，轮到两派中的另一派（兵团）被称为阶级敌人了。他们在1968年两派的武装冲突中造成了三人死亡，他们也被认为是反大寨的先锋。大寨村是毛泽东树立起来的农村发展的典型。

毛一直在清理阶级队伍，但是阶级敌人一直清理不完。直到毛1976年去世，中共在1978年才决定结束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但阶级斗争或对立思维却仍然在以其他形式存在，正如我们下面将讨论的。

关于这种文革思维，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专门讨论文革思维的学术著作并不多见。但是讨论文革，人们就不可避免地提到阶级斗争是文革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麦克法夸尔“（Roderick Lemonde MacFarquhar）”在关于文革起源的开创性著作中提到，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

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以及年年、月月、天天都要讲阶级斗争的必要性。<sup>20</sup> 怀特（Lynn T. White）研究了人们如何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被贴上不同的标签，比如工人、农民、资本家、地主、小资产阶级或流浪汉。<sup>21</sup> 他们也被分为红黑、好坏两种人。<sup>22</sup>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将邓小平第二次打倒的时候，批评他从来不抓阶级斗争，从来不以阶级斗争为纲。<sup>23</sup> 毛泽东曾多次声称（并真的相信）三分之一的国家政权掌握在各种阶级敌人手中，这些敌人的人数有几十万、几百万或数千万之巨，而且还在不断增长。<sup>24</sup>

因此，在文革期间，不仅地主和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都被视为人民的敌人；几乎所有党的领导干部都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文革被视为推翻旧阶级的、纯粹的、根本上的“继续革命，” 尽管这个所谓的旧阶级并没有对政权构成任何可信的威胁。

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与敌对思维密切相关。只要不是自己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敌人。这种判断不仅基于阶级，还基于国籍、宗教和社会组织等社会特征。简而言之，它针对的是不像自己那样“纯洁”的人。这种敌对思维又和下面描述的思维模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运作。

### 三、从反 AB 团和延安整风延续到土改和文革中的谬误推理、独裁、非人化思维

我们在这一部分讨论非黑即白、极端思维；只要结论、不要证据；无限推导、无限上纲；思想专制；蔑视人的尊严等问题思维。

#### 1. 非黑即白、极端思维 (False Dichotomy)

在党的眼里，谁反对土地改革，谁就是人民的敌人，就是斗争的对象。<sup>25</sup> 每个地主都是邪恶的剥削者。地主阶级和国民党是人民的敌人。在石门口村，石拉宝、魏富傲、魏富锁三人，在侵华日军投降后，阎锡山军队返回平时，没有与其他村民一起逃跑，因此，他们被视为国民党特务而在除奸反特时被用石头砸死。<sup>26</sup> 魏富傲的儿子和侄子随后自杀，以避免同样的命运。日占时期西郊村长郝崇孝，尽管他当时也为中共军队服务，但被视为叛徒并被用石头砸死。<sup>27</sup> 一个人必须要和中共站在一起，否则就是反共，就是国民党或日本占领者的同路人。这里没有灰色地带。

在文革期间，好人和坏人之间的二分法也非常明确。九类份子，包括他们的孩子，都是坏人，尽管对他们的指控很少或者根本就无法得到证实。事实上，好阶级与坏阶级、朋友与敌人、人民与敌人之间的大部分二分法都是错误的，就像之前的土改时期的情况一样。分类是基于主观感知而不是客观事实。尽管如此，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还是造成了严重后果，许多无辜者因此丧生。

## 2. 只要结论，不要证据 (Argument from Ignorance)

诉诸无知或者没有证据就下结论，在肃清 AB 团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是一个公认的方法。例如，在后一个运动中，师哲问康生，“要抓的这些人的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我们怎么抓人？怎么审问？”康回答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sup>28</sup> 到了核实谁是国民党特务、谁不是的时候，结论的常用语言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sup>29</sup> 这等于还是给被审者留了一个尾巴。

在平定的土改运动中，人们甚至没有问师哲所问的问题。他们只是简单地相信并接受了别人给他们的结论。即使那些富人家庭的干部也是如此。这些人占县级以上所有干部的百分之五十以上。<sup>30</sup>对他们来说，唯一的选择是相信党、坚决支持党的决定，要求家人将所有财产都交给农民。否则，他们的家人就会被斗争并被杀害。<sup>31</sup>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揭发自己家剥削农民的“恶劣事实”，认识到地主即是罪恶，穷人就是真理。<sup>32</sup>一位名叫杨怀旺的干部，痛斥自己的父亲是国民党特务、地主、恶霸，被群众处决是罪有应得。这里没有争论的余地，也不需要证据来给人定罪。

在小桥铺村，工作队队长梁宝贤指责任何他不喜欢的人为国民党特务。因此，刘全孝因为没有用白面做美餐招待梁宝贤，被贴上了国民党特务的标签并被杀害，尽管村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有任何国民党特务活动。<sup>33</sup>

同样在文革中，如果有人被指控有不当行为，也不需要证据。平定中学的音乐老师陈元才，曾经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文革中他无法忍受斗争会的屈辱，逃到了东北自己的家乡。他回来以后就被指控说想向苏联修正主义者投降，因为他的家乡靠近苏联。<sup>34</sup>像平定县委副书记郑忠华一样，所有干部都认为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sup>35</sup>但对他们的指控是不需要证据的。没有理性的分析，没有客观的判断，在他们被斗之前，结论就已经做出来了。

### 3. 无限推导，无限上纲 (Continuum Fallacy)

第三个谬误推理是无限推导、无限上纲。延安整风运动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名叫钱维仁的年轻人，在自然科学学院的墙报上画了一朵向日葵，

便被怀疑是“心向日本”，因为他的画看起来像菊花，而菊花是日本国的国花。<sup>36</sup> 晏甬带了一队文化人到延安，在审干中，人家说“你这人什么都懂，肯定是特务！”<sup>37</sup> 当时流传说康生看人长得漂亮就怀疑人家是特务。如果有人坦白大会上神情紧张，他或她一定是个大特务。<sup>38</sup> “脸变红的是特务、脸发白的也是特务、出汗的是特务、哆嗦的也是特务。”工作积极是潜伏特务的伪装；工作消极是敌对份子的破坏。<sup>39</sup> 只要有人指控你，就可以给你定罪。

同样的思维也贯穿在了平定的土改和文革中。一份文件给下面工作的人的建议说，如果地主来找政府官员询问他为什么被斗争，他应该被告知说你既然被斗，就证明你有问题。否则，群众为什么不斗别人呢？<sup>40</sup> 就像在整风运动中一样，如果你被斗了，说明你一定有问题。在南坪村，一位名叫小二巴的土改积极份子向一个工作队队员说，共产党的军队进攻太原（山西省会）现在遇到了困难。于是他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在散布对中共胜利的怀疑。他被殴打并被勒令交代他的国民党组织。最后，他承认他的小组一共有十一名成员。结果这十一个人都被脱光衣服，活活打死。<sup>41</sup>

在平定文革中，看似无辜的言论都可能将人投入监狱或遭到批斗。平定县的副县长之一郑子英被指责反大寨，因为她重复了一位同事的评论，说大寨也有缺点，就像旗杆上可能会长虫子一样。<sup>42</sup> “反大寨”是一项危险的指控，是要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因为大寨是毛泽东树立起来的农业方面的模范。另一位干部张起杰也被指责反大寨，因为他说大寨去年底收成不如前年。<sup>43</sup> 县广播电台工人岳增寿因批评大寨虚报产量、说陈永贵在日本占领时期曾经有过汉奸行为而被投入监狱。<sup>44</sup> 一个叫付实征的县干部，因写打油诗抱怨三鲜汤价格太高而被指反社会主义，由于受不了那没完没了

的批斗而投入茅坑自杀身亡。<sup>45</sup> 县医院医生姜永禄，因为在一张纸上写了“社会统治着我的灵魂”，被按照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批斗导致他上吊自杀身亡。<sup>46</sup>

#### 4. 思想专制 (Thought Dictatorship)

上面引用的所有例子实际上都与思想专制有关。在思想专制的情况下，任何对主导意识形态提出的那怕是轻微的挑战都会立即被镇压。无论是在土改运动还是文革期间，党的路线只有一条，也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人人都必须遵循。在平定土改运动期间，中央局杨献珍召开的会议明确指出，只有支持土地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任何反对土地革命的人都不是真党员。<sup>47</sup> 如前所述，那些来自富裕家庭背景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并告诉他们的家人不要反抗土改。正确的思维方式是，农民和地主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后者与美国、蒋介石、阎锡山是站在一起的，前者则与共产党和八路军站在一起。农民阶级是好的，地主阶级是坏的。在思想或行为上，都不许有任何偏差。

在北京文革期间，韦君宜的丈夫杨述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剃了阴阳头，被批斗时脖子上还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标语牌。韦君宜和他说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不如到厨房把煤气打开，了却残生，免的零碎受苦。”但是杨述却和她说，“不！我估计这次运动搞成这样一定是有反革命份子混进来了。也许是国民党搞的。这种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相信毛泽东永远正确。坏事都是别人干的。他还嘱咐女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跟党走。<sup>48</sup>

毛泽东本人和他的思想体系，包括他关于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指示、他对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党的领导的指示，就像林彪说的那样，一句顶一万句，任何人都不能质疑。文革当然也不能质疑。邓小平 1973 年复出的条件是不能翻文革的案。但是 1975 邓小平又被毛以右倾翻案的名义搞下台。对毛来说，任何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越轨都是不可容忍的。毛是永远正确的。

正如平定中学红卫兵董成科在《平定小报》上的文章中所说，“我们红卫兵的战斗武器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这是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谁要违背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坚决和他斗到底！”<sup>49</sup> 和这种越轨思想和行为斗争的方法包括将敌人视为非人类。这是我们下面一节讨论的问题。

## 5. 蔑视人的尊严

在土改运动中，要想让农民和地主划清界限，以便消灭革命的敌人，农民需要主动排除人道主义，克服“良心”思想。<sup>50</sup> 在平定城的一次斗争大会上，地主、绅士们吓成“一滩鸡毛”。“一气斗倒奸霸头子周克昌等四十九个。”<sup>51</sup> 在这群被斗的人中，最著名的是周克昌。周克昌曾在民国初期担任过国会议员、天津市政府高官、平定中学校长。在平定（路北）的一个叫新庄的村子，有 69 户人家被作为地主、富农来斗争。在全村 233 户人家中，他们占了 33.7%。他们都被“扫地出门”，335 人流落街头，在村里或附近的村庄靠乞讨为生。<sup>52</sup>

妇女受到的羞辱同样残酷。小桥铺的地主高重阳的妻子，被吊起来打，追问家里的粮食和珠宝藏在什么地方。她被打得尿尿从裤腿里流了出来。<sup>53</sup>在大石门村，人们逼贾锁义的妻子交出所谓的银老虎，交不出来就用钳子夹拧她的肌肉。她被折磨的遍体鳞伤，最终也还是没有能交出银老虎，因为本来就没有。另一名来自富裕农民家庭的妇女因涉嫌与另一名男子发生男女关系而被剥光衣服吊在房梁上供年轻男子拍打抚摸。<sup>54</sup>东回村的一位地主石海云被处死，他的妻子戴着一顶高高的纸帽，抹着花脸，指甲上钉着针，被游街示众。村民还让她扫街，有时候被人赶着，有时被人骑着，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sup>55</sup>有时人们还给斗争对象戴上牲口戴的铃铛，竭尽羞辱之能事。<sup>56</sup>很少有人能忍受这种羞辱和折磨。

这就是前述韦君宜在文革中为什么要对她丈夫建议自杀。在被指控各种莫名的罪行并遭受各种虐待和羞辱时，平常人真的很难接受。她无法忍受这种羞辱，尽管他丈夫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劝她要相信党。<sup>57</sup>一般人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北京大学季羨林教授回忆起学生们如何殴打他，向他脸上吐口水，他又如何在不同的批斗会上忍受屈辱。<sup>58</sup>他描述了当有人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殴打他时，他几乎失去知觉时的感受。他不敢躲闪，“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顶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他说自己的脸上、嘴里、耳朵上、鼻子上都流着血，好在眼睛还能张开、牙没有被打掉，“不至于生命交关。”第二天他还要照样干活、照样背毛主席语录。他感觉到自己也完全迷糊了，“迷糊到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sup>59</sup>他想知道人类怎么能忍受这样的残酷折磨。

对人类尊严的漠视也可见于平定的文革。我们在上一章已经做了一些讨论。

这里是更多的例子。一名据称与其他男子有不正当关系的妇女被强迫在脖子上挂着几双破鞋、耳朵上吊着两只西红柿游街（“破鞋”是对这些女性的羞辱性指代，“烂柿”是当地人对她的蔑称）。葛东海，一位精通《易经》的算命老先生，游街批斗的时候，脸被涂成黑色。当时的学生们并不觉得这是对人格的侮辱、人权的践踏，只是觉得好看、热闹。<sup>60</sup>

以前的革命干部现在都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斗，脖子上还挂着巨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牌子。<sup>61</sup> 张庄村的老革命干部张万祥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而跳桥自杀了。副县长郑子英说学生们用上面有钉子的板子打她手臂，流血不止，子宫也被踢得出血。学生们自己也害怕了，把她送到了医院。<sup>62</sup> 李成柱在两派武斗期间被兵团一派打死，后来局势稳定下来后，他的妻子去找县委书记李计春（任职期间 1972-1974），要求落实政策恢复他的名声。但该书书记说，“死了就死了，落实什么政策？”<sup>63</sup> 正如王蒙所说，当时的主导思想是，被组织抛弃、背离了领导的人，只能“向隅而泣，死了也不过是臭一块地。”<sup>64</sup>

就像在苏区反 AB 团、延安整风、土改等时期一样，在文革期间，暴力和不把人当人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特征。越残酷就越革命。红色恐怖随之而来。杨绛写到，她所在的五七干校当时收容了两千名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分子，那些自杀的人被埋葬时连棺材都没有；那些被关在那里的人们每天要在田里工作 13 到 14 小时，即使生病也不允许请假。<sup>65</sup> 没有人的尊严。一个人越残忍、越血腥、越暴力，他或她就会显得越革命。无情的斗争、恶毒的攻击、自虐、虐他、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已经算是太温和了。当时的想法是：只要目标是高尚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包括暴力。

阶级斗争的基本意识形态本来是要引向一个纯粹的未来，消除剥削，惩罚那些压迫劳动人民的人。但是为了这样一个看似高尚的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吗？

（未完待续）

注释 .....

- 1 本文原文题为“Cultural Revolution Thinking in China: Its Development and Manifestation in Pingzhou County from Land Reform Onwards,”发表于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27, 2018, Issue 110. 中文版略有修改。
- 2 关于文革思维的讨论，也见段协平：“关于文革恶习和文革思维”，共识网，2014年5月7日；唐开宏：“‘文革思维’的本质”，2013年3月14日；张梦阳：“论‘文革’思维”，《南方周末》，2012年8月6日。
- 3 我对这一主题和比较方法的强调，要归功于 Lynn White 教授和 Borge Bakken 教授的提醒。本文的论述因为他们的帮助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 4 Michael O'Meara, “Carl Schmitt's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he Occidental Quarterly*, April 5, 2010.
- 5 关于暴力的历史，请看 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1); 特别是 Barend J. ter Harr, “Violence in Chinese Culture: Bibliography by Barend J. ter Haar,” at <https://bjterhaa.home.xs4all.nl/violence.htm>, last revised 5/4/2025.
- 6 平定县志编撰委员会，《平定县志》（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第6、9、67-68页。
- 7 郝志东：《生死存亡十二年：平定县的抗战、内战与土改》（台北：元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2021）；郝志东、黎明：《平定县里不平定：山西省平定县文革史》（台北：致知学术出版社，2017）。
- 8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25页。
- 9 同上，第323页。
- 10 同上，第487-488页。
- 11 同上，第548页。

- 12 同上，第 504-505、546-547 页。
- 13 同上，第 593 页；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81-382 页。
- 14 引自高浦棠、曾鹿平：《延安抢救运动始末》（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第 410-411 页。
- 15 同上，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 597 页。
- 16 同上，第 599 页。
- 17 采访 LNP0-2。关于平定土改的历史，也请参考本人上引专书《生死存亡十二年：平定县的抗战、内战与土改》。
- 18 平定联合办公室：《翻身通报》，第 3 期，1946 年 8 月 22 日，平定县档案第 23 卷。
- 19 “平定县委土地会议结论（1）”，1947 年，平定县档案第 54 卷，文件 #4。
- 20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第一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大跃进 1958-1960》，（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 年），第 165-129，275-277 页。
- 21 Lynn T. White,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9), p. 10.
- 22 Andrew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37.
- 23 Quoted in Roderick MacFarquar and Michael S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07.
- 24 引自胡鞍钢：《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 年），第 29、35 页。
- 25 《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布置与大会讨论结论 1》，平定县档案第 49 卷，1946 年 11 月 7 日。
- 26 采访 LNSMK6-6。
- 27 采访 LNXJ6-7。
- 28 郝在今：《文革前史：延安抢救运动纪实》（香港：利文出版社，2006 年），第 100 页。

- 29 同上，第 199 页。
- 30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I》（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0-61 页。
- 31 见前引“平定县委土地会议结论(1)”。
- 32 二专署办公室、王力行、曹有壁：“二专署查挤行动成绩大，”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 年 9 月 9 日，第 3 页。
- 33 采访 LNXQP6-8。当时的主食是玉米。
- 34 郝志东、黎明：《平定县里不平定》，第 167 页。
- 35 同上，第 466 页。
- 36 郝在今：《文革前史》，第 54 页。
- 37 同上，第 86 页。
- 38 同上，第 199 页。
- 39 同上，第 111、125 页。
- 40 “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布置与大会讨论结论 3”，平定县档案第 49 卷，1946 年 11 月 7 日。
- 41 访谈 LNNP6-3。
- 42 郝志东、黎明，《平定县里不平定》，第 280 页。
- 43 同上，第 534 页。
- 44 同上，第 572-79 页。
- 45 同上，第 493 页。
- 46 同上，第 542 页。
- 47 前引“平定县委土地会议结论(1)”。
- 48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第 115-117 页。
- 49 郝志东、黎明：《平定县里不平定》，第 124 页。
- 50 《平定县群运总结》，平定县档案第 23 卷，文件 #7,1946 年 10 月 10 日；王琦、张发：“平定群运中的问题与我们的解决意见，”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 年 5 月 11 日，第 2 页。
- 51 龚胜荣、李秀峰、冯廷淮、志远：《平定城关连续斗争》，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 年 7 月 15 日，第 2 页。

- 52 宣传部：《平定县土改工作总结》，1948 年，平定档案第 50 卷。
- 53 采访 LNXQP6-8。
- 54 访谈 LND SM6-1。
- 55 采访 LNDH8-1。
- 56 采访 LNP D0-2。
- 57 韦君宜：《思痛录》，第 115 页。
- 58 季美林：《牛棚杂忆》（北京：外语教研出版社，2010），第 81-88、107-110、143-46 页。
- 59 同上，第 159-160 页。
- 60 郝志东、黎明：《平定县里不平定》，第 175 页。
- 61 同上，第 217-34 页。
- 62 同上，第 280 页。
- 63 同上，第 437 页。
- 64 王蒙：《中国天机》（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第 159-160。
- 65 引自赵信：“五七干校，一个‘地上天国’的破灭，”FT 中文网，2016 年 5 月 19 日。



黄奕信画作